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项目

· 文化与文学论丛 ·

新文学运动方式的转变



Xinwenxue Yundong Fangshi de Zhuanbian

钱文亮 ◎ 著

但具体到“新文学运动方式”的设计与操作，其参与者的内部却是有很大分歧与冲突。我们试图探寻的，就是在“新文学运动方式”的转变过程中的种种设想与实践，及其最终被规范、统一的历史图景。

上海文化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项目

新文学运动方式的转变

钱文亮 ◎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学运动方式的转变 / 钱文亮著.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80740-591-7

I. ①新… II. ①钱…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9735 号

出版人

陈鸣华

责任编辑

赵光敏 王 珺

装帧设计

汤 靖

书名

新文学运动方式的转变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l.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邮政编码: 200020

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25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9 月第一版 2010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80740-591-7/I·566

定价

30.00 元

敬告 如本书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T: 021-65410805

序

杨剑龙

从文化的视角探究文学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从事文学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种现象，这尤其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们所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国门，国外的哲学思想、文学思潮纷至沓来地被介绍进来，在转型期的中国，不仅是一种经济的转型，更是一种文化的转型，人们的思想观念、思考方式等都发生了变化，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从文化研究的视角研究文学便成为一种倾向，这可用更为开阔的视野观照研究文学，可以更为深入地探究文学背后的文化现象与原委。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借鉴西方新批评方法的囫圇吞枣不同，在文学的文化研究过程中呈现出一种比较清醒与深入的境况，在深入研究文化批评的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以比较贴切深入的方式展开文学研究，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

这辑“文化与文学论丛”共为四本，《文化的震撼和心灵的冲突——新时期文学论》（杨剑龙）、《后新时期文化与文学论》（杨剑龙）、《新文学运动方式的转变》（钱文亮）、《知识分子影像与文学话语场》（刘忠）。杨剑龙的著作将改革开放后的文学分为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两部著作分别编入了这两个时期文学的研究成果。钱文亮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博士，其著作努力从“新文学运动方式”的转变这一角度，彰显其丰富的文学史意蕴，取得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更充分的观察与理解。刘忠是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博士后，其著作上编选取六位代表作家，论析他们的文学创作与心灵轨迹；下编以问题研究的方式，探寻新时期文学话语的

变迁及内在逻辑演进。这几部著作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式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其中将研究对象置于文化大背景中、运用文化批评的方式，成为丛书的一个共同倾向。

改革开放后，人才的流动与竞争成为一种重要现象，学科的发展与竞争离不开人才的引进，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便是依靠着人才引进而不断发展的，我是于1987年在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获得硕士学位后来上海师范大学的，后来又在职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攻读文学博士。钱文亮、刘忠是先后引进的人才，对于充实与发展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辑“文化与文学丛书”的出版，也可以说显示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学术研究成果。本辑丛书本计划学科点的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每人一部，但是有的教师的著作已出版，有的教师手头尚未完稿，因此暂且编辑出版四部。倘若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出版“文化与文学论丛”第二辑、第三辑。

是为序。

2008年8月于瞻雨斋

目 录

CONTENTS

序 杨剑龙 / 1

导论 新文学运动的现代性考察 / 1

第一章 “新文学运动”的概念与新文学史叙述方式的确立 / 2

第二章 “运动”的现代性与“新文化运动”的现代语境 / 16

第三章 “革命”的意义：作为社会运动的“新文化运动” / 38

上编 新文学运动方式的初始形态 / 55

第四章 “新文学运动方式”的概念界定 / 56

第五章 新文学运动方式的五四模式 / 63

中编 新文学运动方式的政治裂变 / 107

第六章 政党组织的介入：新文学运动方式的裂变 / 108

第七章 “抗敌文协”：战时文艺组织的准集权形态 / 155

下编 新文学运动方式的转变 / 197

第八章 从党的组织到文学的组织 / 198

第九章 “沙龙”与“大会”：延安文艺运动方式的建立 / 229

主要参考文献 / 248

后 记 / 253

新文学运动的现代性考察

山月论

「新文学运动」的概念与新文学史叙述方式的确立

「运动」的现代性与「新文化运动」的现代语境

「革命」的意义：作为社会运动的「新文化运动」

第一章 “新文学运动”的概念与 新文学史叙述方式的确立

—

在1998年第6期的《文学评论》上，洪子诚以《“当代文学”的概念》为题，从加强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目的出发，通过对“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概念的相互关系中“意识形态”因素的辨析，从文学史研究与文学运动开展的关联入手，对“当代文学”这一概念的生成过程与文化机制进行了严肃的清理和考察。正是通过对这一此前许多人一直盲目依附，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学科概念的深刻反省，使得作为一种知识话语的“当代文学”学科有了一个坚实而清晰的基础。

洪子诚对“当代文学”概念的辨析，其启示意义当然并不仅限于当代文学这一个学科。甚至于像他本人所表示的，“也不会只限于（甚至主要不是）文学史学科的范围”。它所涉及的问题其实关乎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相对于以往文学史研究中喜好建构新的体系、更换概念、改变分期方法的习惯行为，洪子诚认为对于原来的概念、分期方法等加以审察，分析它们出现和被使用的状况和方式，从中揭示这一切所蕴含的文学史理念和“意识形态”背景，“也是一项并非不重要的工作”^①；因为“文学史的概念和分期方法，都包含着政

① 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文学评论》1998年第六期。

治、历史、社会、教育、文学等因素的复杂影响和制约——因而，也可以说都有着‘意识形态’的含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都有‘人为’的性质……这种‘人为的划分’，对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来说，不仅是文学史家‘事后’（对已逝的‘历史’）的描述，而且更是文学运动的发起者、推动者对所争取的文学前景的‘预设’，对某种文学路线的实施。就后者而言，这里提供了观察文学史研究和文学运动开展之间复杂关系的实例。”^①

根据洪子诚的观点，在讨论“当代文学”的生成时，我们无法离开对“新文学”与“现代文学”等概念的考察。这应该是一个普遍性的工作。任何有关文学史的研究和文学实践的追踪、批评，都需要以概念的考察为前提。因此，本论著在进入正文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新文学运动”等概念的考察。

关于“新文学”概念（或作为文学史学科的“新文学史研究”）被“现代文学”（或“现代文学史研究”）取代的过程，洪子诚、贺桂梅等学者已经做过具体而细致的清理^②。概而言之，大致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有关“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文学史论著和作品选，大多使用“新文学”这样的名称。在此期间，“现代文学”这样的概念很少被使用，个别以“现代文学”命名的著作，也主要作为“现时代”的时间概念使用。如《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1932）、《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王哲甫，1933）、《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王丰园，1935）、《新文学概要》（吴文祺，1936）、《中国新文学大系》（赵家璧主编，1935—1936）等。同样使用“新文学”名称的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和周扬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虽然晚至1982年和1986年才正式发表，但都产生于二三十年代，是作者在学校里授课用的讲稿。使用“新文学”概念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50年代一段时间。除了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外，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卷1951，下卷1953）、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1952）、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1955）、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下卷，1956），这些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

① 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文学评论》1998年第六期。

② 参见洪子诚的《“当代文学”的概念》和贺桂梅的《人文学的想象力》（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的文学史著作，也都称为“新文学史”。只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新文学”的概念才迅速被“现代文学”所取代，以“现代文学史”命名的著作，纷纷出现。与此同时，一批冠以“当代文学史”或“新中国文学”的名称评述1949年以后大陆文学的史著，也应运而生。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发生的这种概念更替，被洪子诚看作是开展文学运动的结果。事实上是当时的文学界在建立一种文学史“时期”的划分方式，为当时所要确立的新的文学规范体系，通过对文学史的“重写”来提出依据。在二三十年代，因为在时间上和心理上与发生的事情有较近的距离，因此，对于“五四”文学革命及这一“革命”成果的陈述，尤其在事实的限定和材料的处理上，不同的作家和学者之间，有较多的共通性。他们大体上把“新文学”看作是对“旧”文学（或“传统”文学）取得革命性变革的文学现象。尽管如此，对“新文学”的陈述和阐释，一开始就存在许多不同，这也预示着后来立论和阐释方向上的严重分裂。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新文学史论著，对于《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作家》（钱杏邨）、《论民主革命的文学运动》（冯雪峰）、《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等著作中所存在的一些共同点和许多的分歧，以及这些历史叙述者不同的身份、知识背景、个人的历史处境，他们所信奉的历史观和文学观及其所表达的不同集团、派别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评价和未来设计，洪子诚等学者也都进行了类型分析。在这里，我不再赘述。我所关注的，主要还是对“新文学运动”等概念的考察。

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新文学史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终结的。而对于1917年以后的中国新文学实践的历史考察与描述，1933年出版的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被认为“是第一部新文学史著作”^①。耐人寻味的地方正在这里：“新文学”自一开始就与“运动”密不可分。除了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之外，最初的几部新文学史著作都以“运动”这一概念为新文学的实践命名。这些著作包括1934年3月出版的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5年9月出版的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运动述

①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4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评》(北平新新学社),以及后来周扬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①。这一点几乎体现在所有的新文学史著作中,一直到1990年代。不管这些著作叫“中国新文学史”还是叫“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

视“新文学”与“运动”为二而一、一而二的观念不仅直接体现于新文学史著作的题名上,而且更进一步地落实在新文学史著作的体例、分期和具体的章节安排上。最早在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②中,就将文学运动和文学论争作为重点论述;而后,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更将重点放在“运动述评”上,在内容上专设“戊戌政变以后文学的新趋势”一章,对新文学发生的思想与阶级背景等作了介绍,较早地肯定了俄国十月革命对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重大影响;但对作家创作的评介却相当简略。在1936年4月由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的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一书中,作者明显接受苏联弗里契理论的影响,“从政治经济的变迁中”探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之于新文学的影响,认为“文学革命运动随着五四运动的高潮而扩大,而进展”(该书第27页),然后列举了五四运动后白话报纸的风起云涌和各地类似《新青年》、《每周评论》的报纸杂志的大量出版,认为这与“新兴阶级的胃口”直接相关,它们能够充当这“新兴阶级”宣传自己主张的“新工具”(该书第28页)。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真正具有体系化理论并自觉以“运动”观点来解释、描述“新文学”实践的发展过程的新文学史著作,大多产生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发表之后。在30年代末与40年代初,毛泽东继他的哲学写作之后对中国现代的历史文化作了较集中的研究。他先后发表的文章《五四运动》(1939年5月)、《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5月4日)、《〈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

① 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第一届的必修课程中即有“中国文艺运动”一门。第二届增设文学系,又设“中国文艺运动史”,作为该系与美术、音乐等系的共同必修课。1938年至1940年,由周扬担任这一课程。为讲授这门课,周扬曾编有《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不过仅为自己讲课之用,未曾发表,而且也只完成引言、第1、2章和第3章的一部分。1986年,《文学评论》第1、2期发表了引言、第1、2章的原稿。

② 此书为作者1929年至1933年间在北京师范大学和燕京大学的讲稿,198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艺论丛》第14辑根据该讲稿的铅印本发表。

党》(1939年12月),尤其是在延安《中国文化》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①,上继陈独秀、瞿秋白的思想精髓,集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之大成,对中共的文化立场作了最后的确定,并且基本确立了中共关于现代化史的叙述方针,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对中国共产党在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作出了界说。实际上,这也就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文化部分,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中心环节^②。在这些论著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对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现状作了系统的分析。首先,他提出了观察文化问题的方法论,确立了讨论问题的基本前提。这就是,在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政治、经济革命与文化革命之间的关系上,强调前者对于后者的“决定”作用。他指出,“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这为左翼文学界开展的文学运动,和与这一运动紧密相连的对文学的历史叙述(文学史研究),确立了应予遵循的原则。据此,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范畴及其历史区分,并通过对不同文化形态的等级划分,确立了反映新的经济基础和先进阶级的意识的“新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及其在由各种不同的因素构成的“新文化”中的决定作用,在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更高序列与先进性质。毛泽东的个人文化观念不仅使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在理论体系上得以成熟与规范,完善了关于马列主义的文化叙事,使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新文化”中的正统性,中共成为中国革命领导力量的必然性,得到合法性的论证,而且,也成为中国左翼文化界各种文化理论与文化史方面具体的建树与批评的总的思想来源。文学史研究当然也不例外。文学发展阶段的问题,也就伴随着对“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发

① 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随后经过整理,该演讲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题名在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公开发表。此后不久,在当年2月20日延安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上,该文第一次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名发表。

② 李书磊:《走向民间》,130—131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展阶段的确认而被确认。此后，特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史叙述上，主要就是对毛泽东个人文化观念的落实。虽然周扬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就是在《新民主主义论》刚刚发表不久，最早将其运用于新文学史研究的尝试，但“讲义提纲”迟至二十世纪 80 年代才正式发表，在很长时间里并未对文学史研究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出版于 50 年代初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就被普遍认为是“第一部”“力图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的新文学史^①。

限于本文的选题与论述角度，在周扬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中，我所感兴趣的不是该著作对毛泽东文化观念的贯彻与落实，而是其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以“新文学运动”这一概念作为关键词来结构和涵括整个新文学的实践历程。“讲义提纲”的“引言”相当于“绪论”，第一章以“新文学运动之历史的准备（1894—1919）”为题，讲的是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变，主要内容是戊戌维新后的文学改良运动；第二章“新文学运动的形成（1919—1921）”，讲的是五四文学革命运动。“讲义提纲”根据毛泽东的新文化是新经济、新政治的反映并为其服务的观点，认为“新文学运动是在意识形态上反映民族斗争社会斗争的”，“文学上的一切理论斗争，新的口号与新的运动，就都是反映这种情况的”；认为“新文学运动正式形成，是在‘五四’以后”。对这场运动的背景，“讲义提纲”认为：“假如在外部条件上没有十月革命的影响，没有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哲学思想和艺术理论的介绍，没有以苏联的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的文艺作品的大量移植，在其内部条件上没有从五四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新文化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以及共产主义思想在广大人民中的传播，和许多共产主义者的作家艺术家的努力，那么新文学运动的形成与发展是不能想象的。”不难看出，周扬在这里已经对“新文学运动”这一概念所涉及的内容有了独特而较完整的诠释。

作为一部未完成的新文学史著作，周扬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的全部内容可以说都是关于文学运动的。这倒越发显出“新文学运动”已

^①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133 页。

经正式成为新文学史这门学科“知识”的基础，成为体现了新文学的性质，联系着新文学的问题，具有特殊的生产语境与含义的关键词。通过对其非本质化的知识考古学分析，不难看出其背后隐藏着的更重要的思想文化生产机制、更真实的历史动机和更完整的精神世界图景。

尽管周扬的“讲义提纲”在当年并未正式发表，但他所采取的毛泽东式的对文学历史的叙述框架与结构，却并非他一人所独有。以“运动”的观点来解释、描述“新文学”实践的历史发展过程很快成为此后新文学史著作撰写中人们普遍采取的模式。1944年5月，由河南前锋报社出版的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成为第一部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书名的新文学史研究著作。尽管在体例、材料和观点等方面这部著作都提供了新东西，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但在总的撰写体例、新文学史的分期和具体章节安排上，仍然受到了毛泽东式的新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影响。作为抗战时期出版的一部新文学史，这部著作没有采用流行的阶级观点，表现出疏离于政治的比较客观的学术立场。所以它在介绍五四文学革命的成因时，与以往著作不同，并不从政治上、思想上的变动说起，而是偏重于文学自身的原因。尤其重要的是，此书在叙述了文学革命运动之后，还总结了这个运动之所以取得胜利的三个原因：第一是这个运动遵循了进化的原理；第二是适应时代者胜利；第三是有系统的理论的成功。

新文学既是遵循进化历程的产物，当然适合时代的需要。有这两点，自然提倡者会造出他们的理论系统。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都是有组织、有系统的主张。加以响应者像刘半农钱玄同诸人的补充，自然是在理论上立于不败之地。而反对派，如林琴南、胡先骕、梅光迪，以及以后的吴芳吉、章士钊等，他们对于新派只不过是吹毛求疵，而对于古文学又不能道出自己拥护的所以然来，因之他们的理论，就不免陷于支离破碎，简直经不得新派的一击。（139页）

作者任访秋能够清醒地意识到新文学的建立与开展、文学革命运动的

成功在于坚实而系统的理论主张，这是克敌制胜而后得以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作者强调地指出这一点，让人不能不佩服他的敏锐与卓识。

当然，与在此之前和之后的政治色彩鲜明的左翼学者的新文学史相比，任访秋的著作可谓独树一帜，有自己独特的文学史观和叙述方式。其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他在对新文学史的整体认识上不同于他人。具体说来就是在新文学史的分期上，他不像许多左翼学者那样主要依据政治运动和思想斗争划分文学发展的阶段，而是完完全全依据文学创作的演变过程来给新文学分期。另外，对新文学史上的运动，他也有自己的理解与判断，并不将任何一场运动单纯地归功于某一个人的呼风唤雨，而将当时各类人物的代表性意见一一列举，以此呈现历史的实际情状及其复杂性。

新中国成立前最后一部新文学史类的著作是1947年9月由现代出版社出版的蓝海（田仲济）的《中国抗战文艺史》。此书共十章，除首尾两章为“绪论”和“后记”之外，第二章“新文艺发展的路向”，是对五四到抗战爆发十几年间新文学的回顾，重点放在文学运动上；第三章“抗战文艺的动态和动向”，则全面记述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轮廓；从第四章开始，分别记述抗战时期通俗文艺、报告文学、小说、戏剧、诗歌和文艺理论的概况和成就。很显然，在撰写体例和结构上，这部书已经将“文学运动”与“文学创作”并置分论，且以“文学运动”统领“文学创作”，二者关系表现为总论与分论的等级性质。从这里我们当能联想到，中国现代文学的那种“逆向性”特征（即从一种文学形态的理想出发，展开创造这种文学的实践）^①，不仅仅表现于具体的文学实践，同样也内化于文学史研究者的思维方式与叙述方式，其具体表现就是：强调文学运动、文艺论争（实质是政治运动、思想斗争）对于文学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文学自身内在的艺术变革要求与复杂的艺术演变过程则被有意无意地轻视或忽略了。因为有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社会及其文化形态的分析作依据，有正在迅速取得胜利的现实的政党力量、政治权力的推动和规范（体制化），特别是因为以毛

① 参见王富仁：《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逆向性特征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逆向性特征》，见《王富仁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泽东思想为核心的中共意识形态在理论体系上日趋成熟与规范，使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新文化”中的正统性，中共成为中国革命领导力量、民族利益代言人的必然性，均得到充分的合法性论证，这样一来就很轻易地以“时代潮流”、“历史发展规律”的本质化叙事，征服、规训了现代中国几乎所有信奉进化论和现代化的左翼和非左翼知识分子，这种治史思路与叙述方式到了建国以后甚至成为独一无二的文学史叙述模式。

二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出于建立和巩固政权合法性的叙事要求，包括新文学史类著作的撰写在内的所有文化（尤其是文学）活动都被作为建构和强化国家意识形态的工作来看待。1950年5月，中央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新文学史成为一门新的学科纳入国家统一的教学计划，成为大学中文系的必修课。从那时起，作为国家统一的新文学史教材，必须按照由教育领导部门组织制定的新文学史教学大纲来编纂，而且大多采取有组织、有领导的方式来进行，从而使得“集体撰史”成为此后新文学史著的普遍现象。

建国以后新文学史研究者的治史思路与叙述方式可以说在某些方面直接承袭了周扬的“讲义提纲”，例如突出强调无产阶级对新文学运动最重要的领导作用，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和文学运动、文学斗争的介绍。这种治史思路与叙述方式经过第一次文代会上郭沫若依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所做的关于“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艺”的总报告，以及周扬、茅盾分别对抗战以来解放区、国统区文艺发展情况所做的回顾与总结，不久以后，再经过中央教育部《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的具体贯彻落实，最终从新文学史观到编纂方法、编纂内容上完成了它的“一体化”^①。在这种制度化的规范之下，此后的新文学史著作，基本上是个性模糊、面目相近，叙述五四文学革命的成因时，不仅突出政治革命的影响，

^① 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

而且从阶级力量的变动来解释，进一步突出无产阶级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领导，所以在文学革命中，就以介绍思想革命为主，强调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而语言革命之于新文学发展的作用与意义，被大大淡化；在叙述新文学发展的历程时，又重在描述这种领导作用的加强，对其从思想影响到实现组织领导的过程不吝笔墨。与此相应，无产阶级思想在新文学发展中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就成为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整个新文学史，而对各种文艺思潮的记载，对小说、诗歌、戏剧等各领域创作理论的成就与贡献，则大多轻描淡写，以至于毫不提及。另外，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的鲁迅，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被认为是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①，由此而来，几乎所有的新文学史著作，都给了他最显著的地位，并为他设立专章。

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尽管被认为是正式出版的“第一部”“力图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的新文学史，但《史稿》对毛泽东思想的贯彻并不“彻底”，尤其是缺乏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的方法，与“指导思想”存在诸多矛盾。因而，在政治上它曾受到一致批评^②。而后来出版的新文学史，就大多有意识地克服它的“政治上的缺点”，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清新文学发展中的主流、支流和逆流，对作家作品和文学“派别”按革命的、进步的、反动的进行“类型”的等级划分；尤其非常强调文学对于革命的从属关系。在这些著作中，同样是一个人独立编写的一部新文学史，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③就表现出与王瑶著作的明显差异。相比之下，《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第一次鲜明地以中国革命史为纲，将新文学史作为革命史的一部分来叙述，明确指出“现代文学运动是为革命运动所规定”的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于1940年2月20日《解放》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

②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145页。

③ 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